

乡村振兴

近年来,武汉围绕农村资源要素和产权制度进行改革,推进农村资源资产化、集体资产股份化、城乡收益一体化的“三化”改革,探索出一条振兴乡村之路。

土地流转农房抵押,农村资源资产化

去年下半年,江夏区法泗街八塘村村民易志林抵押自家农房,从银行贷款10万元,在他家附近一所高校食堂中再承包一个窗口,两个食堂窗口加上流转的20多亩种植水稻,去年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元。他说:“流转的土地、农房的房子都可以抵押贷款,这在以前都没法想象。”

承包地、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被称为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“三块地”。武汉市农委主任谭本忠说,长期以来农民对承包地、宅基地只有承包或使用权,必须通过改革让权属资产化,使资源变财富。

武汉市通过完善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、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与抵押融资等改革,推动农村资源要素流动。

“农村各类资源权属只有能交易、可抵押,才算真正的资产化。”武汉市农交所总经理孙晓燕说,目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、集体“四荒地”使用权、林地使用权等11类农村产权均可在武汉市农交所内挂牌交易、抵押融资。

截至去年底,武汉市农交所组织各类农村产权交易3631宗,涉及面积134.98万亩。农村产权交易价格呈稳步上升态势,去年土地经营权交易价格达到平均每年每亩566元,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31.63%。

“共有”变“共享”,集体资产股份化

村集体资产经营增收难、收益分配难、日常监管难,长期是农村集体经济做强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瓶颈。武汉市以蔡甸区作为改革试点,探索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、分配自主化、监管常态化,实现村集体资产从理论上的共有,变成现实中的共享。

蔡甸区群力村有580亩集体土地未分包到户,一直是村民矛盾焦点。村支书周木林说,村里不少外来空挂户,也有姑娘嫁户口没迁走的,集体土地收入分给谁,不分给谁矛盾很突出,“钱不多可问题大,最后只能每亩每年120元租给农户”。

2016年底群力村成立土地合作社,将580亩土地折算股份分给1728名村民。首批60亩土地按每亩900元流转给企业虾稻连种,租金收入按股分红。“这样不仅能做大村集体资产‘蛋糕’,村民都能从中公平获益。”周木林说。

目前蔡甸区9个试点村中共有9938人获得集体资产股份,集体经济总收入超过4500万元,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.1万元,与改革前相比都实现大幅度增长。

“过去村民只要把户口迁走,就自动丧失村集体收益分配权。”蔡甸区曾铁岭村支书万明安说,现在股份化改革后,股份随人走,即便户口迁进城,也能继续持股,“给农民吃了颗定心丸”。

武汉市农村经营管理局局长尤俊说,结合前期试点情况,武汉市计划在未来三年内,对全市2000多个行政村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。

市民下乡农民进城,城乡收益一体化

每天种菜、养羊、喂狗,武钢退休工人谌鄂湘空着城市房子不住,选择在武汉新洲区汉子山村租住的农房中,过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田园生活。

“我和朋友喜欢乡村生活,大家退休后就相约找到这个山村。”谌鄂湘说,他所在农房的房主已搬到城区居住。经过简单翻新、修缮,以租期10年、每年3000元租金租下农房,“每天生活特别悠闲、充实”。

武汉市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,随着城镇化提速,大量农民进城,农村不少农田、农房闲置;同时大量有下乡需求的市民、资本却因政策限制受阻,“坚守底线,打破壁垒,才能畅通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渠道,避免农村空心化”。

经摸底,武汉市长期闲置农房占总量比例达15.8%。对此武汉市出台“黄金20条”扶持政策,鼓励市民下乡租用农房养老、创意、创业,形成市民组团下乡休闲养老,企业进村办厂开民宿的热潮。

据统计,去年武汉市农村空闲农房签订出租协议10078户,年租金达到1.49亿元,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、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总额达到22.12亿元。

湖北省委副书记、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说,坚持“富民导向”“问题导向”“改革导向”,就能真正让“市民下乡有盼头、能人回乡有劲头、企业兴乡有干头、农民增收有奔头”。

(记者周甲禄、李劲峰)新华社武汉电

农民运动会连续举办32年



▲江西省鹰潭市信江新区夏埠乡农民运动会已连续举办32年。2月27日,夏埠乡全乡10个代表队共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包括拔河、袋鼠跳、螃蟹赛跑、跳绳等比赛项目。(柴玲琳摄)

武汉推进“三化”改革振兴乡村

三年长出十个瘦西湖

扬州人为何青睐建公园？

新华社南京2月27日电(记者王存理、蒋芳、陈聪颖)扬州古代园林鼎盛一时,瘦西湖、个园、何园等曾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识。记者近日到扬州采访,从基层群众、社区干部到市委书记,不约而同地郑重推荐当地的公园建设。

乍暖还寒,花不红、草不绿的公园究竟有什么可看的?又为何有看头?

治污增“绿”,见缝插“园”

登上扬州城东的万福大桥俯瞰,京杭大运河等7条河流冲刷出了8座岛屿,形成了“七河八岛”51.5平方公里、十里长廊生态奇观。走进公园,篮球场、足球场、秋千区设施齐备;沿着堤顶公路向北,不时有骑车和跑步健身的市民经过;再往北走,陆续经过深潜赛艇运动基地、万方数据等入驻企业。

“过去嫁人不嫁廖家沟,如今新环境带来新经济。”万方科创书院副总经理黄娟告诉记者,这里曾经又偏又穷,船厂、砂石厂、养牛场聚集,水体污染严重;2011年,行政区划调整为新中心,也成为开发商追逐的焦点;如今,这里成了生态科技新城,核心区建成了10.7平方公里的廖家沟城市中央公园。

生态倒逼,不仅把养牛场逼出了大数据产业,还把拆迁安置区逼成了高品质住宅区。

傍晚时分,记者来到原小茅山垃圾填埋场——如今的花都汇公园。恰巧碰到了附近社

区居民刘万芬,她告诉记者,过去这里有条黑臭河,2011年瘦西湖隧道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泥浆也被运送至此,日晒风干形成了一座黄土山。如今,垃圾处理机械变身工业景观,水系绿地呼应,还配备健身步道、雨廊、条椅等。每天日落,附近居民到此散步、锻炼。

“这里曾是房价洼地,现在高档小区集聚。”刘万芬指着旁边的一所小学自豪地说,“这可是全市最好的小学。”

在上海工作的吴頔春节返乡时,发现小区旁破旧网球场变成了建筑精美、设施齐全的“口袋公园”。“公园虽小,但一草一木布局用心,健身器械和健身步道一应俱全,更重要的是,就在家门口。”吴頔说。

“如果说园林曾是古城扬州的标志,公园则是现代扬州的标配。”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说。2015年,“让生态成为市民的永续福利”被写入扬州市政府工作报告,迄今全市新建了大大小小城市公园上千个,总占地面积超过11平方公里,相当于10个瘦西湖核心景区的面积。

“三个舍得”探索生态惠民

2012年底老体育场拆迁一度引发信访风波。谢正义对记者说,当时不明白拆掉市中心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老体育场,到城郊建个更现代化的,何以引发百姓那么大的反感。

“深入听取民意发现,百姓在意的不是体育场,而是身边的体育休闲场地。”

从民怨中听民声。2013年扬州将紧靠瘦西湖景区的千亩土地建设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。拿出黄金地段,再投入13亿元建公园,也曾引发干部群众不解。直到2014年公园免费开放,在人潮涌动与群众点赞下疑虑化为乌有,迄今已接待600余万人次。

“今天有没有去宋夹城啊?不夸张地说,这个公园改变了周边居民的生活,连见面问候语也变了。”退休人员杨永兰说。

怎么衡量建公园是民生不是形象工程?扬州的标准是——能不能做到三个舍得:舍得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,舍得投入资金配套,舍得投入心思规划建设。

每个区域建一个生态中心,人口集中区建生态体育休闲公园,老城区见缝插针建“口袋公园”。2015年以来,扬州每年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5%用于植树造林和园林绿化,保证生态投入增幅高于GDP和财政收入增幅。市级财政在绿化和公园维护等方面累计投入近65亿元,市级土地储备从2009年5700亩增加到目前10138.73亩,人均绿地面积从17.18平方米提高到18.58平方米。

改变城市“颜值”,提升城市价值

采访中多位干部群众用数据、用感受,直

沈建佳:173名各族孩子的“爸爸”

春节期间,新疆边陲小城特克斯,沈建佳的家很是热闹,前来拜年的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、柯尔克孜族、汉族客人络绎不绝。

年过花甲的沈建佳,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一名普通的退休干部,住在县城南边一处不起眼的平房小院内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叩开沈家大门就算是回家了,因为沈建佳是他们最亲密的“阿塔”(哈萨克语,意为“爸爸”)。

担当:“苦孩子”同一个“爸爸”

“阿塔,您还好吗?”22岁的哈萨克族小伙别克阿力仔细端详着沈建佳。沈爸爸身板仍然结实,但多了些白发。

沈建佳开心地指着头,一把挽住别克阿力,穿过院内狭窄的走廊,步入一幢内室宽敞的新屋。“这房子是你6个弟弟的卧室,政府去年给新建的。”沈建佳指着正享受寒假的“儿子们”,向别克阿力一一介绍,“他叫阿衣布力,17岁;这是巴格兰,今年16岁……他们有的来自贫困家庭,有的是单亲家庭,和你一样都是苦孩子……”

2007年,由于家里兄妹多、耕地少,不堪重负的父母要求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别克阿力中断学业。“沈爸爸知道后把我接回家,管我吃住,供我读书。”别克阿力现在已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,还在县城组建了自己的小家,“是沈爸爸给了我的一切。”

沈建佳曾是军人,后转业到特克斯县林业局工作。从1986年开始,他陆续接收一些贫困家庭的农牧区孩子到自家住下,短则二三年,长则七八年,直到他们完成学业、走向社会。

32年来,他先后帮助173名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维吾尔、蒙古、回、汉等民族濒临辍学的孩子走进课堂,其中不少人考上了大学。

其中的艰辛付出可想而知。年轻时,沈建佳多次相亲失败,原因大多是女方嫌他家“人口”



▲沈建佳和孩子们(2月24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张晓龙摄

太多,负担太重。而今,退休了,他月退休金超过5300元,在当地算是不错了,可几乎没有存款。但沈建佳从不后悔:“不读书,苦孩子就会一直苦下去,我吃点苦不算啥。”

行动:让孩子学会感恩

1958年,两岁的沈建佳随家人迁至特克斯县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生活。由于家境贫寒,他吃着维吾尔族、蒙古族、哈萨克族

邻居的百家饭长大。

1979年,23岁的沈建佳参军。他在人民军队努力学习,刻苦训练,多次立功受奖,入伍第一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“作为一个新疆人,我永远感激养育我的各族乡亲。作为一名中共党员,我要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”他说,一定要让孩子们学会感恩。

这些年,他坚持筹措资金为偏远农牧区的孩子赠送文具、书本等学习用品,几乎每次都带上家里的孩子一起去。

用生命守望正义

追记“全国模范检察官”周会明

定给畜群注射疫苗。

在驻藏工作期间,周会明以“业务精湛”为抓手,通过改造升级技术,加强人员培养,带出了一支过硬的多民族检察队伍。

为提高干警办案能力,周会明提出“请进来、走出去”思路,开创了“组团式援藏”的先河。

经他协调,安徽检察系统先后选派23名业务骨干到山南挂职,与当地干警组成多个办案组,在实践中“传帮带”;6名山南干警被选派到安徽培训锻炼,获得面对面指导。

“师傅教会我正确方法,给了我信心和勇气,感觉我每天都在进步。”短短两年,藏族干警玛扎西从“怯场新手”成为办案骨干,他尊称周会明为“师傅”。

爱藏如家,他与山南干群心连心

援藏期间,周会明成了高原上的“拼命三郎”,从线索初查、审讯、固定证据到后勤保障,他样样亲力亲为。加上山南地区平均海拔3700米,高寒缺氧,他的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。2013年,周会明援藏到期,但是在山南同志们的盛情挽留下,他毅然选择再干一任。

为了与西藏干群有共同话题,周会明认真学习当地文化书籍,了解风土人情。看到山南检察院办公用品不足,他联系亲友赞助了近20万元的电脑和设备。

周会明有一次到洛扎县办案,当地一位藏族检察官因缺氧患有多血症,身体极度虚弱。他回来后立即安排把自己的制氧机送了过去。

周会明生前用过的手机至今还存着一张照片:他与一群藏族孩子在空地上踢足球,孩子们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2015年秋,周会明到浪卡子驻村,听说教学点缺少文体用品,便和朋友们一起捐助1万多元,开车走了四五个小时山路把文体用品送到海拔4000多米的教学点。这张照片就是周会明与孩子们玩足球时拍下的。

“如今你有了两个家乡:一个在平原,一个在高原。”援藏期间,周会明先后荣立一次二等功和一次三等功,被山南市委评为优秀援藏干部,连续两年被评为西藏自治区“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。

猝然离世,他生前诠释大爱

2017年8月,经组织研究,周会明赴宣城任市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。在新的岗位上,他以“观念新、作风实、勤学习”成为当地干警心目中的典范。

“他分管很多业务,但对经手的每一个案子都不轻易放过,特别专业、细心。”宣城市检察院侦查处检察官助理杨凌说。宣城市检察院案管中心主任汤军说,周会明特别注重科

技对检察事业的助推作用,“他对大家说检察机关要与时俱进,要思考互联网+的作用。”

10月,周会明赴京参加“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”颁奖礼回到宣城,得知院里的一位老驾驶员患肝癌,需要肝移植手术。虽然素未谋面,周会明却将获得的所有奖金全部捐给了他。

去年底,妻子曹菁发现周会明脸色发暗,人也瘦了,多次催他检查,他说年底太忙,春节后再说。今年元旦,身体已很虚弱的周会明在妻子的“逼迫”下到医院检查,确诊为肝癌晚期。1月3日,在组织安排下,周会明到上海就诊,但病情仍无法控制。12日,带着对未竟事业和家人的不舍,他离开了人世。

“会明走得太大太突然,这位检察楷模,10天前还战斗在工作一线,转瞬间生死两隔。”谈到周会明的离世,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感到无比沉痛和惋惜。

出于个人兴趣和对父亲的敬仰,周会明的女儿周宇虹本科学的是法律专业。今年即将毕业的她说未来的志向是从事法律工作,继承父亲的遗志。

曹菁对女儿说:“咱们就当爸爸回西藏上班去了,他热爱那片土地,那边的老百姓也都由衷敬爱他。爸爸能为自己热爱的检察事业付出一辈子,我们该为他高兴。”

(记者余俊杰、徐海涛)

新华社合肥2月27日电

为了心中净土,他主动两任援藏

“我热爱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,爱心中的那一片净土。”周会明生前曾谈起过进藏的初衷是因为一次自由行。

初到西藏赴任,周会明从电视新闻中发现了有一条案件线索:2011年底山南地区加查县发生口蹄疫疫情,给当地群众造成了几百万元损失。他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失职行为,立刻组织干警追查,查明乡干部未按规